

011469

# 贵阳知青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著

## 图志

方志出版社

---

# 貴陽知青

---

貴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編著

## 圖志

方志出版社

1

## 《贵阳知青图志》编委会

顾 问 赵英民 吴志刚 章德华 史继忠  
主任委员 王亚平  
副主任委员 郑荣晴  
委 员 刘正绪 陈 贤 邓中伟 龙尚学 周惠平  
何静梧 魏西林 陶文正 夏秦豫

## 《贵阳知青图志》编写组

主 编 王亚平  
副 主 编 郑荣晴  
撰 稿 王亚平 刘正绪 郑荣晴 陶文正  
编 审 郑荣晴 王亚平 刘正绪  
编 辑 刘正绪 郑荣晴 金 枚 岑永枫 郁晓岚  
编 务 郁晓岚 梁 莉 王 浩 漆国梅 袁昌顺

## 《贵阳知青图志》编委会

顾 问 赵英民 吴志刚 章德华 史继忠  
主任委员 王亚平  
副主任委员 郑荣晴  
委 员 刘正绪 陈 贤 邓中伟 龙尚学 周惠平  
何静梧 魏西林 陶文正 夏秦豫

## 《贵阳知青图志》编写组

主 编 王亚平  
副 主 编 郑荣晴  
撰 稿 王亚平 刘正绪 郑荣晴 陶文正  
编 审 郑荣晴 王亚平 刘正绪  
编 辑 刘正绪 郑荣晴 金 枚 岑永枫 郁晓岚  
编 务 郁晓岚 梁 莉 王 浩 漆国梅 袁昌顺

早在1964年，贵阳市就有3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立志到农村“滚一身泥巴，做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是贵阳的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在短短的期间内，积压在城市的三届高、初中学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农村。至此，一度震撼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为上山下乡运动所替代。贵阳市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也几乎都被安置到农村。

40年过去了，当年的知识青年都已年过半百，“上山下乡”这个特定的词汇已成陈迹。然而，怎样看待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特别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场震撼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仍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有显著区别的。应该这么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当时一批青年学生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激情和抱负自愿奔赴农村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解决大量青年学生既无法升学也无法就业的一种无奈之举。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所必然造成的非常态局面。

剖析和评价历史遗产是一件严肃的事，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他们不会用“壮举”或“噩梦”这样简单的词汇去褒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现代社会已成长得更为理性。

走向农村，走向农场，走向边疆的一代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尽管有着以上所述的复杂而沉重的社会政治原因，尽管他们对于陌生而艰苦的生活环境的精神准备严重不足，然而他们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着顽强的青春活力——于是我们看到，他

贵阳知青

# 贵阳知青

们中的绝大多数勇敢地迎接了严峻现实的挑战，没有蹉跎，没有沉沦。有许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公社的父老乡亲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有许多知识青年为改变当地农村的贫穷面貌做出了真实有益的贡献。从广义上说，知识青年在农村都经历了一场极为艰辛的磨炼，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使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貌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读到了鲜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这些知识青年是最为关注国计民生的群体，这是他们从生活中所获得的——尽管当时未必意识到——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在此之后，他们有的进了厂矿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从各类学校毕业后，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尽职尽责，成为本单位本部门的中坚力量。还有不少知青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从某种角度说，青春岁月的艰辛化成了许多知青的后半生奋斗的营养和力量的源泉。所以有哲人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对于生命原动力和生命价值的认识，众多当年的知识青年是感悟至深的。

为了形象地记载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情怀，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从所搜集到的数千幅照片中精选出四百余幅，编辑出版了这本《贵阳知青图志》。这本图志的出版发行，对于过来人当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新一代青少年读者而言，也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无论在何种境况下，始终是这样地热爱生活，始终是这样地热爱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衰败的根本保障啊！所以，当市志办的同志嘱我为这本图志作序时，我欣然应承了。这不仅因为我是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也不仅因为我也曾是当年“知青”群体的一员，而是我真心以为，这样的历史记录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它就像树木的年轮，展示在读者面前，你观看这年轮，就会联想到生命之树的勃勃生机，还会进一步思索个体生命对于社会奉献的特殊意义。

貴人  
陽  
知  
青

一场令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掀起初澜，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大潮涌起，70年代中期又起大潮，最终于1980年大潮跌落。这场长达20多年、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其发展演变首先是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为动因的，后又夹着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而最终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口号的变换就是一个例证。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2年至1979年，全国共有1776.48万名知青下乡，其中插队1282.21万人，集体场队203.08万人，国营农场291.19万人。其间，中央财政拨款75.5亿元，动用木材343.4万立方米，建知青屋近300万间。诚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对解决当时的城镇就业问题在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然而，历史却并不如此简单，从1952年至1979年这28年间又共有2,500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种城乡劳动力的大交流，使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初始目标的城市就业问题最终也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而这场运动却已在千千万万知青的心灵上打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也许至今还隐隐作痛。他们中一些人本该走进大学校门，历史却让他们走进了山乡那广袤的大地。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岁月曾蹉跎着他们，他们却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编织了美好的梦境。当他们在黄土地上耕耘了几千个日日夜夜，迈着蹒跚的步伐又重新回到城里的时候，或许欣慰，因为终于结束了磨难；或许痛楚，这段历史是何等苦涩；或许平

# 贵阳知青

淡，沧桑正道，不可抗拒，顺其自然罢了。

对这段曲折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难用正确与谬误去予以评价，尽管这场运动已结束了24年，但历史是不会忘记的。因为这场运动波及1,800万知青，几乎涉及中国城镇的每一个家庭；它曾经是怎样地震撼着人们，尤其是1,800万知青乃至他们的父母、儿女，“知青”这个代名词，是如何地使他们刻骨铭心？！

贵阳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知青运动的一个部分，它没有、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而只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罢了。从1956年的11名青年垦荒队员开始，经过1964年、1965年千名知青到市郊农村插队，1968年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直至1978年最后一批知青下乡，这22年中贵阳市共有43,500人上山下乡，它震撼的可能是上百万人的心。这段轰轰烈烈、曲曲折折、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史，需要呈现在每一位关心知青的读者面前。我们将从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极为有益的。为此，人们曾以纪实散文、小说等形式，从一个侧面去记录这些历史的片断。现在，我们又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知青图志》来进行记载，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记录这段令人魂牵梦萦的历史。这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知青们保存了几年、几十年，它们已经陈旧得发黄，然而却在细细地述说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知青故事……



# 目录 *MULU*



序一 ..... 许 朗

序二 ..... 濮振远

第一部分 追寻历史的足迹 ..... 0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008

接受“再教育” ..... 014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 020

第二部分 难以忘却的岁月 ..... 022

到农村去 ..... 024

组建知识青年之家 ..... 050

生产劳动 ..... 068

记分员 ..... 098

乡村教师 ..... 100

基干民兵 ..... 102

赤脚医生 .....	104
政治活动 .....	110
友 谊 .....	138
赶 场 .....	146
亲 情 .....	154
业余生活 .....	158
岁月有痕 .....	180

第三部分 再创崭新的历程 .....	190
离开农村 .....	192
扎 根 .....	196
新 天 地 .....	200
回 访 .....	212
又 相 会 .....	236

*MULU*

第一部分  
**追寻历史的足迹**

D E Z U J I



Z H U I X U N L I S H I

## 追寻历史的足迹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名贵阳知识青年在这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缺乏人才的问题就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此同时，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组织中学生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团委开始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同年1月5日，贵阳市由康发祥等11人自发组织的“青年垦荒队”，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到丹寨县国营农场创建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他们是贵阳历史上惟一的一支自愿垦荒者队伍。

1957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有知识、有文化的第一代新农民”的号召下，共青团贵阳市委和市教育局组织135名中小学毕业生分别到市郊的中曹、朝阳、茶店、洛湾、陈亮等五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次有组织的城

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跃进”时期，这部分知识青年被陆续抽调进入人民公社办的企业或城里的一些单位工作，坚持留在农村的不多。这一时期，全国没有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1963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国家开始将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性工作。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各省、市劳动部门正式把上山下乡作为就业安置的主要工作来抓，全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青团中央将自愿下乡并在农村做出突出成绩的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树立为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贵阳市从1963年起开始对中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鼓励他们立志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8月暑假期间，虽然没有组织集体下乡插队，但各校均有零星“社来社去”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贵阳市第四中学一名初三毕业生自行到丹寨国营农场落户。

1964年开始，贵阳市劳动、教育部门和共青团

团组织相互配合,引导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思想上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升学或下乡的准备)”,加强了动员宣传。6月份,20%~25%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向学校提出上山下乡申请。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各中学均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放弃升学,选择到农村去,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热潮。8月14日,省、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市人民会场举行大会,欢送奔赴农业战线的知识青年。次日,2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赴乌当区洛湾公社和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贵州日报》头版以通栏标题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知识青年代表濮振远撰写的文章《做新时代的新农民》,同时配发了贵阳市第一中学高三(3)班班主任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行的照片。9月5日,各中学又一批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及少数社会青年分赴花溪区、乌当区的农村落户。当年,全市22所中学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有316名到郊区公社生产队和公社林场插队落户。其中高中毕业生56人,初中毕业生258人,另有2名是高小毕业生;有团员75人,班干部40人。

1965年7月31日至8月6日,贵阳市召开“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知识青年代表会议”,170多

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席。有关部门组织代表们到母校汇报在农村一年的劳动心得。报刊和广播电台着力报道了这次会议和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在校学生的上山下乡热情。各中学几乎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写了决心书,很多学生表示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要求下乡去当新农民,建设新农村。8月24日,贵阳市上万人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40余人到花溪区孟关、小碧,乌当区洛湾、沙文四个公社的生产队和林场插队落户。当年全市先后有34所中学的600余名应届和往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贵阳市1964年和196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政策,也是部分学生自愿的选择。知识青年落户的地点,基本都是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社队,安置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校还派有老师带队,下乡的毕业生也基本上按照“本人满意、家庭满意、学校满意”的“三满意”原则选择批准的。这批年龄在15至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怀抱改天换地的理想,决心把农村当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广阔天地”,去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是主动放弃中考或高考,甚至保送大学

的机遇，立志扎根农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决心到艰苦的地方“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基础较好，在农村普遍能吃苦耐劳，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锻炼，很多人成为农业生产强劳力或技术骨干；有的还被推选为社、队干部和人民代表。1964年到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的贵阳知识青年陈贤，1965年被评选为十大“贵州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分子”之一，树立为全省青年学习的榜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阳和全国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断。

从1966年起，全国所有中学、中专和大专院校不再招生，所有单位停止招工。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号召“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68年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指出：“1966年至1968年，全国积压中学生400多万”，并提出“大部分必须安排下乡”。全国各地响应号召，陆续展开了上山下

乡工作，北京的部分中学生率先自愿奔赴内蒙古牧区、“北大荒”插队落户。

到1968年，贵阳市也已经积压全市40所中学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下同）两万余人。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8月21日6000多名“老三届”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六广门体育场集会，表示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9月20日，10余万人在邮电大楼广场集会，欢送贵阳地区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老三届”以及到部队农场锻炼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包括贵阳市大、中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威宁新农民战斗连”、“高原轻骑突击队”、“换新天战斗团”。贵州农学院68级毕业生陈保红、贵州省物资学校68届毕业生魏西林等放弃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加入“威宁新农民战斗连”。10月8日，这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跨校学生自发组成的上山下乡队伍，作为首批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赴平塘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插队落户，将贵阳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

同年10月28日，贵阳地区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指挥部，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

作。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骤然兴起。

在贵阳，遍布大街小巷的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车昼夜不停宣传，街巷的墙壁上几乎被关于“再教育”内容的大字报所覆盖。与此同时，各中学开始大规模地动员和组织，一批接一批的“老三届”被卡车持续不断地送到省内各地农村插队落户。至1969年1月下旬，全市被安置到省内32个县（市）和贵阳市郊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或农场集体插队的“老三届”就有16800多名。另外，各街道办事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动员组织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1969年1月6日，云岩区头桥街道办事处40名社会青年组成“1221新农民战斗连尖刀排”，到边远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农村安家落户，成为贵阳市第一批到农村落户的社会青年。2月，贵阳市云岩区贵乌、三桥、中北、黔东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309名社会青年到毕节地区农村落户。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滞留在城里的“老三届”和社会青年，除少数参军、特殊照顾或因病留城外，几乎全部下到农村插队落户。3月中旬，修文县安置了上海市到贵州省农村落户的449名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中，最初上山下乡还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自觉的选择，到1968年底完全变成了强制性的上山下乡。一代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大批贵阳知识青年被安插到毕节地区、遵义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的贫困山区，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知识青年不仅不能自食其力，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由于下乡的人多面广，安置工作粗糙，知识青年下乡后，即形成无人过问的状态，不但物质生活困苦，有的还受到政治迫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还是能积极面对现实，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认真向农民学习生产知识，参加各种农业劳动，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

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过多年动乱的社会生产开始有所恢复。1970年，贵阳市开始招工，1972年省内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经“贫



下中农推荐，公社选送，用人单位或学校同意”，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招工、招生、招兵等形式陆续离开农村回城。从1970年至1973年，贵阳市没有再统一部署和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应届毕业生大部分被分期分批安排到各类厂矿和街道企业，少数随父母疏散到农村落户。留在农村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基本生存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1973年福建省的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就其子上山下乡生活艰难及开“后门”之风日盛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御状”。毛泽东主席复信中说：“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1973年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革命委员会对贵阳插队知识青年普查后给予补助。每人每月口粮不足18公斤的由国家补足18公斤；1972年以前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一次性补助100元，没有住房的每人补助200元。1973年起，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费标准由230元增加到480元。

1973年6月，首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明确规定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问题的六点“统

筹解决”办法。197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株洲经验”之后，株洲安置方式成为广泛推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的主要形式。

1974年8月至9月，贵州省及贵阳市先后召开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过去上山下乡“一刀切”、把知识青年送下乡便不管不问及三年不动员上山下乡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决定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同时还决定今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形式参照“株洲模式”，改为以建立知青场（队）为主，同时试办集体所有制的农、林、牧、茶场。这些农场采取由企业、单位出资，社队出地的办法，在生产队建立知识青年安置点。其次是厂社挂钩，户口到队，劳动在场的安置形式，分散或集体插队的只占少数。对原过于分散的，加以调整组成知识青年安置点，每个点不少于5人。

1974年和1975年是政策调整后贵阳又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74年，从2月下旬至年底，10个月时间就动员组织了70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农场落户。1974年到1978年，5年间贵阳的省、市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在郊区先后建立216个知青场（队），主要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上山下乡问题。这一期间，贵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7083人，安置在郊区29个公